

西北大学史学丛刊

NORTHWEST UNIVERSITY HISTORY RESEARCH SERIES

2



主编：周伟洲 王欣

三秦出版社

SANQIN PUBLISHING HOUSE

ZHONGGUO XIBEIDAXUE AODILI SAERCIBAODAXUE SICHOUZHILU GUOJI XUESHU YANTAOHUI WENJI
中国西北大学·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丝绸之路国际学术集

中国西北大学·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
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三
秦
出
版
社

西北
大学
史学
丛刊

主
编

王周

伟

欣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北大学史学丛刊: 第2辑: 中国西北大学、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汉、英对照/周伟洲, 王欣主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9. 8

ISBN 7-80628-312-9

I. 西… II. ①周…②王… III. ①史学—丛刊②丝绸之路—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K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5971 号

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2辑

—中国西北大学·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
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周伟洲 王欣 主编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3号楼

电 话 (029)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西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16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312-9/K·108

定 价 32.00 元

在“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上的欢迎词

西北大学校长 王忠民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各位代表：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西北大学，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与会的国内外来宾和专家学者表示深深地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汉唐时期曾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它一方面通过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东方文化，另一方面又以海纳百川之势吸收、融合了丝路沿线诸民族、国家的各种文化因子，成为人类文明史中璀璨、光辉的一页。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联结东西方的陆路交通大动脉，成为各

民族、国家的使者、僧侣、商贾东来西往的通道，而且它还维系着东亚的中国文明、南亚的印度文明、西亚的波斯文明、欧洲的希腊、罗马文明以及古代非洲和北方游牧文明之间的联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丝绸之路也是一条世界文明之路。正是通过这条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织品、印刷术经中亚、西亚传入欧洲；而希腊、波斯艺术与印度的佛教文化同样也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是在这条道路上，既有玄奘的西行求法；也有马可·波罗的东行游历。东西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可谓是源远流长。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古代丝路沿线各地各种考古、探险活动的不断展开，丝路昔日的繁盛景象重现于世。以敦煌·吐鲁番学、藏学、中亚学等为中心的“丝路学”成为国际学术界中的“显学”，丝绸之路的神秘面纱逐渐为世人所揭示。80 年代以来，丝路旅游热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加之欧亚大陆桥的开通，这些对于推动丝路沿线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重振丝路昔日雄风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和奥地利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家。中国有句古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今天，中国和奥地利两国学者汇聚一堂进行学术交流，我们相信，这不仅有助于西北大学和萨尔茨堡大学之间交往和合作，而且对于加强中、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是大有裨益的。我们愿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开展中奥两国大学间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为促进中奥文化的发展尽微薄之力。

在“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欢迎词

西北大学地处古都西安，属全国重点综合大学，创建于1912年，是中国西北地区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60年前，在曾经孕育出周、秦、汉、唐灿烂文化的秦中沃土诞生了西北大学历史学科，它既得地利之便，又有一批知名历史学家，至今已形成独具特色的教学、科研体系和学术氛围。该学科现有：“一院二所一室一中心”。两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一个博士后流动站，一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一个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已培养出大批的优秀人才。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愿我们双方专家携起手来，扩大交流，再树一笔灿烂文化。愿各位专家在西安的日子生活愉快。更希望你们下一次再到西北大学做客。

最后，预祝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丝绸之路是世界性历史交往之路

——在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西北大学中东所所长 彭树智 教授

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西北大学和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今天正式开幕了。在丝绸之路的起点——古都长安，东西方学者聚会一堂，共同讨论丝绸之路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特别是西北大学位于唐长安太平坊，离丝绸之路的商贸中心——西市，仅一坊之隔，我们在这里开会，更具有一种历史感；而隋唐佛教名刹实际寺遗址，就近在咫尺，那历史的悠久的钟声，似乎把我们带回了遥远的过去。这种得天独厚、得地独宜的环境，为我们的学术讨论会准备了浓郁的历史氛围，预示着会议的成功。

萨尔茨堡大学的学者们和西北大学的学者的共同

研究课题是丝绸之路，两方面又有特别的分工。双方各自从丝绸之路的东西两段，用各自的资料和观点，研究有关课题，然后进行交流与合作，这必将提高研究的学术水平。我作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所长，自然也有一个特殊的分工。我们的研究领域正好处于丝绸之路东段和西段的中部，因而这部分地区的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也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在五年前，我就中东地区东段起点的阿富汗地区，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历史交往》。最初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后为《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所转载。现将英文论文复印，发给所有与会外宾代表。既有论文，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在这里，我只就丝绸之路研究中有关理论问题，简要地发表一点看法。

我认为，丝绸之路研究既需要微观研究、中观研究，也需要宏观研究。考证、资料研究的基础，是绝对需要的，但理论研究尤其重要。当然，最好采用理论结合实际史实的个案研究，避免单纯的理论研究。我在前面所提到的文章，就是通过对重大历史个案的分析，探讨一些有关理论问题。这是受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启发，例如他对传播学理论的运用，就是这样做的。

不过，我考虑的不是传播学，而是历史交往的理论。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的大动脉。但是，这条大动脉的动力是什么？丝绸之路的路为何而开拓？因而而盛？缘何而衰？为何而又复兴？如何估价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我以为这一切都需要从历史交

往的角度来观察。交往从哲学上讲，是指主体之间的关系。从社会学上讲，是指人们的社会联系，而在历史上讲，则是指在生产基础上人们之间的交往过程及其规律性。政治交往、商贸交往、军事交往、文化交往、民族迁徙，都是历史交往的不同表现形态。推动丝绸之路的开拓，正是人类从事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过程中不断扩大活动范围，进而把历史由民族地区的历史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人类由原始的、分散的、狭隘的、封闭的人群，走向发达的、整体的、开放的、全球的世界史，也是生产力发展和交往扩大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后来地理大发现即新航路的开拓一样，都是世界性的两大历史交往之路，都是人类文明史发展的阶段性标志。

历史交往有丰富的内涵，结合丝绸之路上历史个案的分析，会总结出东西方历史上许多具体的特征和规律。在这里我不能详细展开，而且有相当多的问题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我只是想说明理论研究对丝绸之路问题的深入探讨，有重要意义。

这次学术讨论会不但充满了历史感，而且还充满了现实性。我们关注着重振丝绸之路的繁荣。我们处于世纪之交的临界线上，我们的学者都对社会进步、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负有义务和职责。这次会议可能是本世纪末我们两校学者最后一次丝绸之路学术会议。我们希望下世纪初我们再次相聚，无论是在西北大学或者是萨尔茨堡大学。我想这是我们的共同心愿。

谢谢大家！

目 录

关于中国境内“丝绸之路”考古的新发现和研究	
.....	徐苹芳(1)
中国西北地区丝绸之路沿线区域自然地理环境	
变迁初步研究	朱士光 唐亦功(9)
历史交往的丰厚馈赠	
——论阿富汗地区的犍陀罗艺术	彭树智(20)
丝绸之路与古今中亚	葛承雍(41)
丝绸之路上的原始印欧人	王 欣(52)
隋朝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	赵文润(73)
唐初中国和尼泊尔王国的交通	萧 生(88)
唐代丝绸之路东段长安至敦煌间的馆驿	杨希义(108)
《大唐天竺使出铭》的研究	孙修身(123)
陕西耀县佛足迹铭的研究	孙晓岗(137)

从出土玻璃器物看隋唐长安与中西亚之文化交流

..... 韩 香(151)

吐蕃丝路的贸易问题..... 张 云(165)

关于《金刚经》产生时间问题的再探讨..... 李利安(177)

15 世纪前西域的基督教 王 静(191)

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及特征..... 黄维民(204)

**The expansion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of Persia to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 Peter Hofrichter(222)

**The Role of "Nature" in Tourism: European
Expectations versus Asian Reality?**

..... Martin Weichbold(239)

The End of the Soviet Union – A New Silk Road?

..... Michael Geistlinger(249)

The Silk Road

The Ancient Artery of Communications between East and West

..... Zhou Weizhou(261)

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葛承雍(278)

关于中国境内“丝绸之路”考古 的新发现和研究

徐苹芳

我在1990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沙漠路线乌鲁木齐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的讲演。1993年9月至1994年4月间，又对这个讲演稿作了补充和修订，发表于《燕京学报》新一期（1995年）和《10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一书中。考古学的发现，日新月异，不过四年的时间，中国境内“丝绸之路”考古又有了若干新发现。不揣鄙陋，在此次国际会议上向诸位报告1994年以来在中国境内“丝绸之路”上的考古新发现和需要补充的材料。

中国境内“丝绸之路”有四条：一是汉唐两京（长安和洛阳）经河西走廊至西域路，这是“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包括原、会北道和青海道。二是中国北部的草原丝绸之路。三是云、贵、川和西藏的西南丝绸之路。四是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第一条路线上，甘肃固原隋和初唐（7世纪）的史家墓地，如史铁棒、史道德、史诃耽、史索严诸墓中均出土东罗马金币和玻璃器。在敦煌石窟不仅发现了对狮、对羊、对鸭、对鸟等斜纹

组织的粟特锦，还有布哈拉旃达纳生产的旃达尼奇（Zandaniji）锦（现均藏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吉美博物馆），最近在莫高窟北区也出土了波斯萨珊银币。

在第一条路线的青海道上，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地的发掘极为重要。出土了很多波斯锦，如联珠纹佛像·狩猎纹锦、黄地鹰纹锦、红地波斯婆罗钵文字锦。这种波斯锦主要产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附近，应是历史上昭武九姓的安国。我们统称之为“粟特锦”。以前在新疆米兰也出土过织有新月纹粟特文字的斜纹织锦，为日本大谷探险队所得，现藏日本龙谷大学。

在第一条路线上出玉门关和阳关进入新疆境内后，依时代和地域上的先后和不同，大致可分为三路：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南为南路，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天山以南为中路，天山以北为北路。这三条路线经始于汉，完成于隋（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这三条路线上最近都有外国遗物的发现。

在新疆境内南路上有且末札滚鲁克1号墓地49号墓出土的萨珊小玻璃杯一件。民丰尼雅汉晋墓中出土的毛织物和料珠项链等。在新疆境内中路上，1996年在交河故城沟西1号墓地1号车师贵族墓内，出土有金冠、金戒指和牛头形绿松石耳饰。1985年在温宿县包孜东41号墓（时代约在汉代）出土有蓝色琉璃珠项链和蚀花玛瑙项链。1989年在库车森木塞姆石窟出土有萨珊玻璃杯。

在新疆境内南路和中路之间的尉犁营盘汉晋墓地，正当南北交通之要冲。1995年在营盘9号墓出土萨珊玻璃杯。营盘墓地出土的毛织物尤其重要，如15号墓出土的红地对人对兽树纹罽袍，采集的鹰蛇飞人罽残片，均属精纺的毛织物，发掘者认为是兴都库什山和阿姆河之间的巴克里特亚地区制造的。营盘墓地出土的狮纹毛毯，也应是中亚输入我国的。

在新疆境内北路上，巴里坤出土的羊鹿直柄镜，昭苏乌孙墓出土的金戒指也都是从中亚输入我国的。

汉唐时代的洛阳，在“丝绸之路”的作用上，与长安有着相同的地位。有人认为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的起点应从洛阳算起，譬如东汉、曹魏、北魏和隋唐初期，洛阳都曾是中国政治中心，其在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的作用上确实是不可忽视的。近年在洛阳龙门东山一窖藏中便发现过波斯银币。1996年在洛阳郊区还发现了波期萨珊银币200余枚，有库思老一世、二世（Chosroes I II）和卑路斯（Peroz）银币。在洛阳偃师杏园1902号唐墓中出土了蓝色水晶石戒面，上刻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铭记。在北魏洛阳城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件仿萨珊玻璃碗的釉陶器，这一发现说明当时西方玻璃器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十分珍贵的，所以，才出现了釉陶器摹仿萨珊玻璃器的情况。

第二条路线即草原丝绸之路。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春秋战国时代，游牧民族便在这片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上活动，中国的丝绸早在此时通过游牧民族从东方传向西方。4世纪北朝时期，北方草原上的东西交通日益重要，至5世纪北魏前期，以平城（山西大同）为中心，西接伊吾（哈密），东抵辽东（辽阳），逐渐形成了一条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当时北魏从平城通西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平城沿鄂尔多斯沙漠东南缘，经统万城（陕西靖边）、灵州（灵武）达姑臧（凉州，今武威）；或更往南走秦州（天水）、金城（兰州）而至姑臧，然后进入河西走廊。这条路线因赫连氏夏和沮渠氏北凉政权的存在，多有阻隔；北魏平夏与北凉后才畅通。另一条是沿平城北面的六镇防线，西过居延（额尔济纳），直抵伊吾，这条路线从4世纪开始一直到11世纪的辽，都是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主线，是连通中西亚和东北亚的国际路线，对中国、朝鲜和日

本与西方文化交流有极重要的作用。在山西大同（北魏平城、唐云州、辽西京）、辽宁朝阳（北朝龙城、唐营州）都发现了不少很重要的西方输入品。近年在内蒙古武川县乌兰不浪曾出土过东罗马金币。在大同东郊北魏墓中又出土了金银器和玻璃器。1989年在朝阳唐墓中出土一枚东罗马希拉克略（Heraclius）金币。在北京西郊西晋华芳墓中除发现有玻璃碗外，还出土有西方制作的银铃，铃的上部有用掐丝工艺制成的胡人伎乐，并用红蓝宝石镶嵌，十分精巧。

第三条路线是西南“丝绸之路”，主要是通往南亚和西亚的路线。近年来中国开展了关于西南丝路的研究，主要是从文献记载和历史地理的考察来论证交通路线。考古学方面的研究较少，但都有相当重要的发现，如在云南江川李家山22号墓和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墓中都曾发现过蚀花肉红石髓珠，是在鸡血石上用化学方法腐蚀出各种花纹来，公元前2000年即在西亚和南亚出现。李家山22号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6世纪，说明在这个时候我国西南地区已经与南亚和西亚有联系。在晋宁石寨山11号和12号汉墓中各出一件镀锡的铜质瓣纹盒，与广州南越王墓和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出土的银质列瓣纹盒的形制完全相同，它们都来自南亚或西亚。近年对佛教的传播也特别着重讨论了南方的路线。当然也包括西南路线。南方确实发现很多早期佛教造像和有关的遗物，如佛像镜和有白毫相的俑，等等。在四川成都等地也发现了早期的佛教造像，尚保存着浓厚的犍陀罗造像风格。

近年，在西南“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西藏吉隆县（宗喀县）阿瓦呷英山口摩崖上所刻的唐显庆三年（658年）《大唐天竺使出铭》，楷书阴刻24行，残存220字左右，记载唐使王玄策率刘嘉宾、贺守一等出使天竺，历经险阻，经“小杨同”过吉隆时，勒石记事。这是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天竺时所刻。

这块铭记证实了王玄策两次出使天竺皆取道西藏，经尼泊尔至印度，即所谓“吐番尼婆罗道”。它的发现确定了这条路线的具体行径。

第四条是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主要是通过沿海对外港口城市的考古，以及各港口通往当时都城交通沿线所发现的外国遗物来做研究的。自汉唐以来的沿海对外港口主要是广州、泉州、宁波和扬州，特别是广州自秦汉以来便是我国最重要的、经久不衰的对外港口，汉魏六朝时，自广州北上走官道过英德、曲江，翻大庾岭，经赣州九江至南京（建康）；或过骑田岭，经郴州（桂阳）、长沙（临湘）至江陵或鄂城，再至南京。这两条路线在近年考古中皆有外国遗物的新发现。当然其它重点仍然是广州、泉州、宁波和扬州的发现。广州下塘狮带岗晋墓曾出土过残玻璃器，经化验为钠钙玻璃。1997年在浙江宁波发现波斯陶碗。南京紫金山东晋墓也出土一件东罗马玻璃杯。

下面我想就近年关于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的研究方面，提出几点意见，请教于诸位。

第一是关于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考古，集中在第一条即长安和洛阳经河西走廊至西域的路线，以及第二条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上。至于西南“丝绸之路”，由于其本身地理环境所限制，在古代究竟如何与南亚和西亚交通，尚有很多疑问。譬如，西南“丝绸之路”上所发现的外国遗物，究竟是经西南本身输入的呢，还是通过海路或沙漠路线输入的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时代最早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在新疆和田也有发现，虽然和田的时代是公元前3至2世纪的，但它却说明蚀花肉红石髓珠不是没有可能是通过西域而传入云南的。从西域入四川和云南的关键通道是经青海通往南方的“河南道”。在4至6世纪西域与中国南方文化交流的通道，

除经海路外，“河南道”也是不可忽视的途径。

第二，在“丝绸之路”上，古代的中国和罗马这两个东西方大国的交通和交流究竟是什么状态？近年有人提到两件事情：一是公元前54年有145名被俘虏的罗马人在甘肃永昌县建立了骊靬古城，并一直衍繁至今。新闻界连篇累牍地报导此事。这本是一个澳大利亚人毫无根据的臆想，学术界没有承认。不知为何，新闻界可能出于猎奇，大炒特炒，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二是有人说在100年时（东汉永元十二年），罗马有一个商团到达洛阳，说得活灵活现，而且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权威杂志上。甘肃永昌骊靬城的事，迹近荒唐，暂不置论。但100年罗马商团到洛阳的事却是涉及到中国学术界学风问题的大事。对于这两件事情，邢义田先生都提出了严肃的批评。邢先生是美国夏威夷大学研究罗马史的博士，现又专研中国秦汉史，他在台湾《汉学研究》第十五卷第一期（1997年6月）上发表了题为《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1985-1995）》一文，认为近十年来，在汉代中国和罗马帝国关系的研究上，不少学者急于论证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曾有直接和密切的关系，如罗马俘虏建骊靬城和100年罗马商团抵达中国洛阳这两件事例，都是基于浪漫联想者多于坚实论据。从考古学的发现，在印度曾出土大量的罗马钱币或其它罗马遗物，但在中国境内，迄今不见任何一枚属于汉亡以前（220）的罗马钱币，极少数几件出土的罗马玻璃器，是否是罗马的原产品或其它地区的仿制品，它是如何进入中国的？如何传入的？都极不明确，因此，目前只能说汉代中国和罗马之间，只能是曾有间接且间断的关系。

邢先生特别论证了关于罗马商团的事。他仔细核对了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 Ca. A. D 70-130）《地理志》的各种译文，均得不出100年罗马商团到中国洛阳的史实。